

中 华 历 史
纪 年 总 表

GENERAL CHRONOLOGICAL TABLE OF CHINESE HISTORY

于宝林 /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 华 历 史
纪 年 总 表

GENERAL CHRONOLOGICAL TABLE OF CHINESE HISTORY

于宝林 /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历史纪年总表/于宝林编著. —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097-1088-3

I. ①中… II. ①于… III. ①中国-历史年表
IV. ①K20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7362号

中华历史纪年总表

编 著 / 于宝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责任编辑 / 孙以年 王 静 陈振藩

责任校对 / 杨丽丽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 108.25

彩插印张 / 4.25

字 数 / 3332千字

版 次 / 2010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088-3

定 价 / 480.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愚不才，寡为序，因与本书有一段不解之缘，略晓成书之本末，故愿藉此刍蕘数语，以贺书之面世。

那还是十余年前，正值愚主持编撰《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之时，身为“辞典”副主编的本书作者除担任撰写有关词条外，还受命编制《中国民族历史纪年表》以作“辞典”附录。本书作者悉力两载，圆满完成使命，不仅具体内容皆据原始资料编就，且反复考辨，匡谬补缺，有所创见，其扎实的学术功底、严谨的学风，受到同仁的好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年表》的编制，并未满足于一般的抄抄画画，而是将制表过程作为学术研究的过程，在我们习以为常之中，从学术角度发现了传统年表中的一些带有实质性的问题。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言：古来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作者从而探索出在新时代年表发展的一条新路子。作者的这些宝贵意见集中地反映在《中国历史年表研究》（载《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中。

本书作者多次与愚交换意见，深感传统年表已不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不能准确地反映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本貌，立志创制新表。为此，作者逊志时敏，经年不惰，广集资料，探讨问题，竭十余年之心血，终成此《中华历史纪年总表》。因之，本书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工具书，而且是作者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内中包含了作者对新年表编撰的一些创造性意见。

十余年中，愚静观了本书写就的全过程，深感其创作的艰辛与学术道路的曲折，遂不揣冒昧，愿在此向读者推荐；至于本书的新意所在，相信读者开卷即可体悟，就不再赘赘了。

高文德
丙戌岁金秋

中国历史年表研究*

(代前言)

一 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时间观念的确立，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即从很早的时代起，就树立了精确的时间观念，并作了文字纪录。传世典籍中，我国自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 年）起，就有了确切的纪年，^① 迄今已逾 2800 余年，前后连亘衔接，不曾中断，在世界上堪称翘楚，实乃人类文明史上一大伟绩。

恩格斯曾言：“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② 历史是时空的展现，而年代则是历史的标尺，只有理清了年代，史事的前因后果才能得以清楚地显示，才能便于人们把握历史前进的脉络，进而探索其发展规律。

抚今追昔，我们的祖先不仅从很早的时代起就发展了天文历法学，而且很早就有了编年史书的创作，除影响深远的《春秋》经传外，洋洋宏制二十四史，首篇本纪即以纪年为纲。正因如此，使中国的历史纪年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连续不辍。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不仅标示着中国古代人民智慧发展较早、较成熟，也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正如董作宾先生在《中国年历总谱》^③ 中所说：“为我国历史文化之菁华，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罕有能与之比伦者乎？”

在先辈留给我们大量的历史典籍中，不仅汉族人民的纪年活动较详，不少少数民族历史活动纪年脉络也非常清楚，这同样是一份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或者说，这是我国文化宝库中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这都需要我们努力去总结、探究与开发。

二 对传统年表优弊的理论分析

作为条析历史年代的工具书——年表的编撰在我国由来已久，有优良的传统。早在先秦时代

* 本文曾载《民族研究》1997 年第 1 期，此转载有所更动。

① 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392 页。

③ 董作宾编著《中国年历总谱》，香港大学出版社，1960。

就有了记载古代帝王牒记的产生，到司马迁撰《史记》时，从该书中收录的《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来看，其编撰体例已相当成熟，精确性与完整性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以至成为后世崇效的榜样。宋以来，有关著作大量涌现，清以后渐从史学中衍生出一门历史年代学。近现代，不少史学大家，如钱大昕、万斯同、陈垣、翦伯赞、齐思和等，都曾涉足这一领域，编撰过各类年表，为丰富年表的内容做出过杰出的贡献。近数十年来刊行的年表也不少，如荣孟源《中国历史纪年》（三联书店，1956）、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商务印书馆，1956；中华书局1978年重印）、刘敬恕《中国历史年代表》（教育图片出版社，1958）、董作宾《中国年历总谱》（香港大学出版社，1960）、文物出版社编辑《中国历史年代简表》（1973）、李德运《中国历史年表》（山西人民出版社，1973）、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年表》（辽宁人民出版社，1973）、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中国历史纪年表》（1976）、郭衣洞《中国历史年表》（台北星光出版社，1977）、台北华世出版社编《中国历史纪年表》（1978）、吴德霖《中国历朝年代干支表》（台北马陵出版社，1978）、柏杨《中国历史年表》（台北星光出版社，1979）、河南博物馆编《中国历史年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陆峻岭、林干《中国历代各族纪年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中华书局，1981）、陈作良、丁柏传《中国历史纪年简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李兆洛《历代纪元编》（中华书局，1985年翻印）（止于1985年，尚不包括中外对照年表、专史年表和大事年表）等。

综观传统年表，其中最突出的长处是连续、精确和使用方便。所谓连续就是从夏、商、周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无空虚之年；所谓精确是指年代不仅准确，具有充分的史料依据，而且每次改朝换代都能标出月份；所谓使用方便是指各种年表都力求列表清楚，一目了然，便于查阅。以上这些长处是我国优秀史学传统的具体体现，也是年表在历代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笔者由于工作关系，经常与各类年表打交道，皆使用前人的成果，从中获得很大教益。近年，因受命在一集体项目中承担编制年表的任务，在实践中深感前人编制年表的艰辛与贡献；同时，也感到学术研究无止境，时代在前进，年表的编制也同样存在着一个随时代前进而前进的问题。不揣冒昧的说，传统年表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时代的要求，需要做相应的调整与改进。也就是说，通行的一般年表确实存在着不可小视的缺漏与弊病，其中有的问题尚未引起我们的重视和从理论的高度加以认识。

首先是收录标准问题。以往编撰年表，根据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大都以“年号”为其收录标准。就是说，在历史上凡建有年号的政权，无论多么短暂弱小，一律收录；凡未建年号的政权，无论为时多长，影响多大，一律不收。随举几例：徐鸿儒所建“大成兴胜”政权，为时五个月；句渠知“平赵”（大秦）、李弘“凤凰”、唐寓之“兴平”（吴）、雍道晞“建义”、刘敬躬“永汉”、吴曦“转运”（[蜀]）、朱宸濠“顺德”、蔡伯贯“大宝”（大唐）等均为一个多月；侯子光“龙兴”（小秦）、向海明“白乌”、刘迦论“大世”、李重福“中元克复”、杜可用“万乘”、林桂方“延康”（罗平国）等这些政权，都不足一个月，诸多年表照收不遗。而对于时间长、影响大的诸如匈奴（从冒顿单于开始有史可查连续年代514年）、^①前仇池（76年）、吐谷浑（307年）、突厥（194年）、^②回鹘（97年，仅西迁前）等政权，却不收录。

^① 算至304年刘渊建汉。见林干《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

^② 算至745年白眉可汗被杀。见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传统年表以“年号”作收录标准，无形中就将很多民族政权的纪年摒除在年表之外。就秦汉时期来看，一般仅收秦、西汉、新（王莽）、东汉等政权的纪年，而对北方的匈奴、鲜卑、乌桓，西北的乌孙、莎车、于阗、疏勒、龟兹、焉耆、车师、拘弥、西羌，南方的南越、闽越、东瓯、东越、夜郎、滇、句町、漏卧等却不收。明时期，只列明和后金，而瓦剌、叶儿羌、准噶尔等未收。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早已向世界表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辉煌多彩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少民族在我国边疆地区以及中原建立过规模或大或小，时间或长或短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的一部分。历史的事实是，相当一部分民族政权在纪年上与汉族不同，他们或一直不采用年号纪年，或在入主中原之前未立年号。“年号纪年”虽在我国历史上占重要地位，但从年代学的角度而论，也仅仅是一种纪年方法而已（其他还有干支纪年法、帝王纪年法、动物〔或谓生肖〕纪年法、星岁纪年法，以及近代广泛使用的公元纪年法等）。我们在编撰年表时必须要从我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历史事实出发，既要看到立年号的政权，也要顾到不立年号的政权，这样才能全面。否则，作为中国历史纪年表将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不能反映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整体风貌。

旧制年表还有一个弊病，即人为地隔断了一些政权的历史，不能全面反映出某些政权的完整面貌与兴亡实际。例如吐蕃政权，由于照顾“年号”，一般年表起始于815年可黎可足（即赤祖德赞），而历史事实是这一年不是这一政权的始建，而只是始建年号。吐蕃政权是在著名的松赞干布（约629~650年）时期建立的，其后尚经芒松芒赞（650~约676年）、赤都松（约676~704年）、赤德祖赞（704~754年）、赤松德赞（755~约797年）、牟尼赞普（约797~798年）、赤德松赞（798~815年）（以上各代都未建年号），才传至可黎可足。这就使我们感到，为了迁就年号，不惜将整个政权的历史从中腰断。这种情况还有：后仇池——在杨难当建年号“建义”前曾历杨定、杨盛、杨玄、杨保宗等四帝王44年，后还经杨文德至杨辟邪（称“武都”、“武兴”）等十帝王82年，前后126年未立年号；柔然——在受罗部真可汗建“永康”前，尚历丘豆伐可汗、蔼苦盖可汗、牟汗纥升盖可汗、敕连可汗、处可汗，共五世62年，“建昌”后还有弥偶可社可汗等共34年；南诏——阁逻凤立年号“赞普钟”前还有皮逻阁，以及称“大蒙国”共历四世99年等，这些在年表中皆阙显。

其实，以“年号”为年表的收录标准也仅是传统的沿袭，只因相互传承，遂成定规，未觉其非而已。仔细探究起来，这个“标准”本身就站不住脚。我们只要翻翻现今出版的一般年表（包括最简要的年表和一些在前言中明确提出以年号为收录标准的年表），还没有一本彻底按此标准行事，因为不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年号”纪年始于汉武帝，在此以前的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有一千多年皆无年号。而我们看到，传统年表都收有这些政权（春秋战国按诸侯国分列，很详细）。要是有一本年表以“无年号”为由将夏至秦排除不列，只从汉武帝开始，肯定会受责为“不完整”，不能正确地反映出中国历史进展的全程。无疑，这个指责是对的，但以同样的理由将诸多的少数民族政权排除在外，为什么不感到意外，反而习以为常呢？这就说明我们在年表的编撰上认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以前人们的认识中，中国历史几乎就是汉族史，或中原王朝史，这种所谓的“正统”史学观念长期影响着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和一些有志之士，为纠正这一认识上的偏颇，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和文章，展开讨论。应该说，这一认识在目前史学界基本上得到了澄清，大家都在努力为研究和撰写富有时代感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史”和各种专史而辛勤劳动。然而，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



出，在年表的编撰上人们的认识没有相应的跟上，对以“年号”为由长期将诸多民族政权排除在中国历史纪年表之外的做法尚未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还需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这一问题。

除认识问题外，还有个研究问题和资料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史籍对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大都比较简略、零散、不系统，不少地方相当混乱。根据这种情况，若要突破传统的“年号”框框给民族政权（特别是未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政权）编制年表，要比因循旧规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如果没有学术界诸多学者对民族史的深入研究和大批论著的出版；如果不对零乱的民族史料下工夫进行一番细致的整理与研究，搞清民族史发展的大体脉络，要想编撰民族历史年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说，纪年表的编撰，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不仅反映出一个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水平。

三 对传统年表的重大突破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民族史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出版了大批论著，如《北狄族与中山国》、《氏与羌》、《匈奴史》、《乌孙研究》、《南诏编年史稿》、《柔然资料辑录》、《成汉史略》、《乌桓与鲜卑》、《仇池国志》、《吐谷浑史》、《敕勒与柔然》、《突厥史》、《女真史》、《渤海简史》、《隋唐时期的薛延陀》、《云南民族史》、《羌族史》、《唃廝囉》、《准噶尔史略》、《古南越国史》、《龟兹古国史》、《喀喇汗王朝史稿》、《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先秦民族史》、《蒙古民族通史》等，澄清了不少混乱的史实，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给编撰反映中华历史全貌的新年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事实上，新年表的编撰已经开始起步，虽然步伐迈得还很艰难，还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很多人尚未认识到它的开拓意义；新年表本身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还有很多的理论与实际问题需要解决，然而这毕竟是可喜的开端，是对年表传统模式的重大突破。

陆峻岭、林干合编的《中国历代各族纪年表》首开先河，突破了“年号”的框框，收录了不少未立年号的民族政权。以后，《中国民族历史纪年表》（为《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继之。在这里，我们不想过细地论述这两种年表的短长，只是以此为例来分析其认识上的意义。这两种年表因在收录标准上摆脱了“年号”的束缚，因而视野更加开阔，所收内容大大超过以前。就秦汉时期而论，一般年表仅收中原四个政权，而前表收了十七个政权，后表又扩收到五十个政权。不仅如此，对秦以前诸民族，如淮夷、徐夷、吠夷、蓝夷、昆夷、山戎、西戎、北戎、条戎、茅戎、白狄、赤狄、豷允、鬼方、郟瞞、义渠、林胡、楼烦、东胡、鲜虞、肃慎等，^① 由于其事迹零散，纪年不连贯，不能作表，他们的活动皆在注解中加以反映。

这两部年表的面世，昭示着新年表的诞生。新年表对传统年表来说，已不仅是量的增加，而己是质的改变，是实质上的创新，是对传统年表一次具有阶段性意义的重要改进；这也是学者们长年不懈努力，深入探索所取得的可喜成果。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一个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问题，新时代向传统年表提出了挑战，传统年表已不能胜任反映新时代中国是多民族

^① 关于先秦“民族”，涉及概念、名称和其他一些理论问题，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本文不作辨明，这里仅据一般史籍记载而言。



大家庭的时代使命，新年表的产生也在所难免。也可以说，新年表是时代的产物，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必然，对新年表的历史价值与深远意义应给予充分的肯定与深入的分析。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这两部年表是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加以提高与改进。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笔者认为，首要任务是尽快总结经验，努力将新年表向前推进一步，使其以崭新的面貌呈现给读者。具体来说，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入手。在理论上需要做的工作是：深入思考，探讨新年表的新特点，上升到理论高度，发掘其深刻内涵，在理论的层面上给新年表以支持，使新年表不仅稳固根基，而且明确努力方向，从而向更高的目标前进。在实践上：全面、细致地总结这两部年表的长处与不足，取长补短，以理论认识为依托，按其所开拓的道路将新年表再推向一个新高度，着力编撰一部反映时代要求，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具有阶段意义的新成果。

四 新年表的其他新特点

上述已及，新年表为我们在年表领域中拓出了一条新路。而新路的开辟也意味着接踵而来的一系列新问题的提出，其中，有些问题是在我们深入探讨后，在更深、更精细的层面上出现的。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其内质，从提高年表的内在质量上着眼，进行思考、改造与创新。

（一）吸取前人教训，革新交叉年的处理方法

历史上改元情况复杂，给年表的编撰带来很大的困难。一个新皇帝即位，有的是当年改元，有的是第二年改元，还有的是过几年以后才改，也有的终身不改，情况各异。如果是当年改元（这种情况很普遍），反映在年表编排上，就有个如何处理交叉年的问题。传统年表大多采取“明头埋尾”的办法。例如661年应是唐高宗显庆六年，也是龙朔元年（当年三月改元），而表上只标有“龙朔元年”的字样，而无“显庆六年”的字样；938年只标辽太宗“会同元年”，而不列出“天显十三年”，其实当年十一月才改元，这一年倒是应以“天显十三年”为主，等等。究其根源，恐怕是受名儒鸿著《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的影响，编年体史书《通鉴》就是只记首年而不记尾年，胡三省注《通鉴》时注意到这个问题，每每加注，这个注解就显得非常重要。后人研究《通鉴》，也多指出其纪年的不当，张煦侯在《通鉴学》中说：“《通鉴》书法，一年两帝，以后来者为定，牵混不明。”^①著名学者梁启超就为此上过当，他在一篇研究玄奘年谱的文章^②中说：“《旧唐书》本传云：‘（玄奘）显庆六年卒，时年五十六。’此说纰缪特甚……显庆只有五年，并无六年耶！官书疏舛，一至于此，可叹！”我们若查《通鉴》，或传统年表，确实没有“显庆六年”的字样，但细寻史载，是显庆六年三月改元“龙朔”，因而《旧唐书》记载不错，而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梁氏上了传统年表标示不精密的当。

如果我们依据这样的年表去查一个皇帝的在位年数，则易入误区。例如，辽穆宗于951年即位，在位十九年，只用了一个年号“应历”，一般年表仅标“应历十八年”，下一年标为“辽景

^① 张煦侯：《通鉴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

^② 梁启超：《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载《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36。



宗保宁元年”，结果相差一年。因而，编制新年表时交叉年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新年表的处理方法是这样的：

例如唐高宗李治时

656	丙辰	显庆 1 高宗李治
657	丁巳	2
658	戊午	3
659	己未	4
660	庚申	5
661	辛酉	6 龙朔①

再如辽穆宗耶律璟时

951	辛亥	天祿 5 世宗耶律阮 应历① 穆宗耶律璟
952	壬子	2
⋮	⋮	⋮
968	戊辰	18
969	己巳	19 保宁① 景宗耶律贤

这样，在一年之中，改元前后皆标示清楚，并注明改元的月份，就避免了使读者迷眩而生误会的弊病。

（二）改进传统名号取谓不定的随意性，完善名号的标示

年表的特点之一在于方便查找。就拿古代帝王的称谓来说，历史沿袭的情况就各不相同，有的是以其名而名世（如三国时的曹丕、刘备、孙权；十六国时的石勒、苻坚、拓跋珪；元时忽必烈；明时朱元璋等），有的则以庙号著称（如唐太宗、周世宗、宋太祖等），还有以帝号显名（如汉武帝、隋炀帝、魏孝文帝等）。少数民族亦如是，有的是以人名闻世（如阿保机、阿骨打、努尔哈赤等），有的是以汗号显赫（如冒顿单于、成吉思汗，以及突厥、回鹘诸汗等）。我们在阅读史书时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不同的史书在不同的篇卷中，对一个帝王的不同称谓往往只取其一，而又取谓不定。为使读者查找方便，新年表则将不同称谓尽量列周全。例如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以往有的年表不录庙号“太祖”；南诏（义宁）肃恭帝杨干贞、大理圣慈文武帝段思良、渤海武王大武艺等，仅标人名而缺帝王号；后燕世祖武成帝慕容垂、前秦世祖宣昭帝苻坚、后凉太祖懿武帝吕光等，于帝号、庙号全无；柔然受罗部真可汗予成、伏古敦可汗豆仑等，人名都无。这些都应一一查对史载，予以补全。

（三）突破传统索引模式，改一元索引为多元索引

各年表皆附索引，无疑给读者带来极大方便，这已成定规，成为年表不可缺少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所见年表，几乎全为一元的年号索引。这种索引有很大的局限性，除年号外，别不可查。如我们要了解石勒、苻坚、皇太极的时代就不能直接查寻。今天，我们要打破“年号”的框框来编撰新年表，再沿袭传统的“年号索引”显然不妥。新年表则改单一的“年号索引”为多元的“综合索引”，除年号外，还将帝（王、汗）号、庙号、帝王名等皆列为索引条目，这样无论是“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朱元璋”，还是“乾隆”等全能查到。这无疑大大扩充了读者的查询视野，既适应了新年表改造后提出的新要求，又凸显出工具书“使用方便”的基本要求。



（四）面对纷繁史事，正视不同史载，既表明作者态度，又尊重不同意见

编撰历史年表，往往会碰到由于史载不一而引起今日学者所持不同意见的问题。例如西汉的起始年问题，辽朝的开国时间问题等，学术界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对夏、商、周等的年代更是众说纷纭）。新年表要涉及诸多的民族政权，这类问题就会更多。例如匈奴冒顿单于，一说立于公元前 209 年，一说公元前 210 年；南越王赵佗，一说立于公元前 207 年，一说公元前 204 年；再如乌孙，一般以西迁为其立国之年，而西迁年代则有四说：公元前 177 年至公元前 176 年，公元前 174 年至公元前 161 年，公元前 139 年，公元前 130 年左右。

面对这种复杂情况，以往有的年表简单化之，采取回避的态度，在年表中只列上作者所主张的一种看法，对其他看法弃而不理。显然，这种做法不足为效，新年表要采取措施加以更改。对历史问题（包括年代）存在不同看法是客观存在，也是极为正常而又普遍的现象。新年表首先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之，正视问题的存在；其次要以透明的方法处理之，避免偏颇。其具体做法是：在诸多不同看法中，可将作者支持的一种看法列入表中，而将其他看法在考证或注解中详细说明。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表明了作者的看法；第二，尊重了不同意见；第三，将问题的全部展现给读者，使读者对实际情况有个全面的把握。

（五）突破传统年表单一寻查年代的功能，探索“年表”与“大事记”有机结合之路

近年，编撰出版的年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皆注入“大事记”的内容，^①似乎成为一种趋势。笔者认为，这标示着年表编撰上的又一重要进展，反映出年表同其他学科一样，在广大受众的关注下，随时代的步伐在不断改进和不停顿地发展。传统的“纪年表”和“大事记”（或称“大事年表”）是两张皮，各附其毛，各张其力，现今开始“姻和”，自然是一桩好事。首先，从直观感受上，“旧貌换新颜”，给读者面貌一新的感觉，不仅丰富了年表的内涵，也更方便了读者；而“方便读者”则是年表作为工具书的一个本质的属性，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再进一步考查，传统年表无论怎样勾画与安排，皆是一页页“冷硬”的骨架而缺乏生气，充实“大事记”内涵犹如注入“人的活动”的血肉，使之丰满而富有灵性。历史是人创造的，“人的活动”是历史的核心。长期以来，传统的历史年表忽略反映人的历史活动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综观近年出版的纪年表和以往出版的大事年表，其作表宗旨，不外是两种取向，一者求其精要；一者力图全面。前者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年表》为代表，时间范围从 20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清代末年，共列大事 670 多条；而后者，有的编成一本书或几本书，数十万字乃至上百万字不等。以上两种宗旨取向各有千秋，满足了读者不同的需要。

作为一种尝试，新年表根据自身的特点，采取“表下注”与“附录”相结合的形式。表下注是将“大事”直接标示于纪年表下，其长处是直观，能与纪年表融为一体，较好地解决“两张皮”的问题。然而“表下注”所能容纳的内容毕竟有限，只能“精要”；如果读者需要进一步

^① 见张显传《系列历史年表》（六种本），海豚出版社，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历史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世界历史年表》，星球地图出版社，2002。



了解更多的内容，则可翻查“附录”，两者互补，充分考虑到读者的不同需求。

尤值一提的是，针对中国历史发展相对的“封闭性”，以及国人看待中国历史文化长此以往形成的“站在中国看中国”的思维习惯，新年表以“开放”、“放眼”的心态首次制作了“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纪年对照表”，以及新作了“中华古文明起源与世界四大古文明对照年表”与“中外对照历史大事年表”（“大事”中注意突出科技、文化等），以史实为基础，为读者构建了一个“站在中国看世界”，或“站在世界看中国”的平台。这些都表明新年表按时代要求，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所做的种种努力。

五 关于创制“读史年表”的初步设想

在我们阅读史籍时，特别是读民族史时，或多或少都会碰到史料零乱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对于年代记载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翻查一般的历史年表往往不能解决问题，笔者想到，若在编撰历史年表的同时，配合历史年表再相应的编撰出一套有关的“读史年表”（笔者暂称其为“读史年表”），无疑会给读者在排疑解难、准确查找历史年代方面带来更大的方便。

众所周知，年表是一种读史工具，它的重要作用是把历史上各种纷繁复杂的纪年加以辨证缕析，用简明的表格形式表示出来，使读者一目了然，方便掌握。因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最大限度地方便读者准确无误地查找历史年代是编撰年表的首要任务。前人所编撰的年表，类型亦可谓丰富。有通史年表、专史或断代史年表、中外历史年代对照表、中西回历对照表、纪元编、朔闰表、历史大事年表等。这些年表都曾发挥或正在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而据笔者所知，在年表的家族中，“读史年表”还是一个空白点，是一个待开发的领地。

何谓“读史年表”？它与一般的历史年表有何不同？顾名思义，“读史年表”专为读史之用，它能解决一般历史年表所不能解决，或不好解决的特殊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在阅读史籍时，翻查历史年表就可以了。例如《史记·匈奴列传》记曰：“伊稚斜单于立十三年死，子乌维立为单于，是岁，汉元鼎三年也。”查历史年表，知匈奴乌维单于是在公元前114年就位的。又如《魏书·太祖纪》记：“天兴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台，（元）仪克邺，收其仓库，诏赏将士各有差。仪追德至于河，不及而还。”《通鉴》记此事曰：“隆安二年春正月，燕范阳王（慕容）德自邺帅户四万南徙滑台，魏卫王（元）仪入邺，收其仓库，追德及河，弗及。”我们据此翻查历史年表，知“天兴”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年号，天兴元年为公元398年；而“隆安”是东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隆安二年正是398年。年代吻合，史实明晰，历史年表在两个不同年号的纪年中间起到了沟通的作用，给我们清楚无误地解决了问题。

然而，历史的现象繁冗复杂，而史籍对史事的记载情况又各不相同，尤其是对于民族史来说，由于种种原因，记载不仅简略，而且混乱之处、疑问之处颇多。凡遇到记载不一的情况，历史年表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例如，当我们读《契丹国志》时，该书记：“天赞三年夏四月己巳，晋王李存勖称皇帝于魏州牙城之南，国号大唐。”（卷一）查历史年表，知“天赞”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年号，天赞三年为924年。当我们读《通鉴》时，该书在“同光元年”下记：“晋王筑坛于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坛，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国号大唐。”显然是记同一事件，然查历史年表，



“同光元年”却为923年。对于诸如此类年代记载有异的问题，单查历史年表解决不了问题，终使读者迷眩而无所适从。

其实，就以上这个具体问题而言，我们只要经过必要的考证，可以辨出正误。然而，我们不能要求读者翻查年表时遇到这种情况都去考证一番，或去寻找考证文章，无端引出许多麻烦。我们若能编出一种年表，将已有的考证成果直截了当地传达给读者，使读者在查年代时一目了然，这无疑是在弥补了历史年表的缺憾。

我们也可将“读史年表”视为历史年表的一种补充，是其功能的扩大与延伸，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历史年表。“读史年表”不仅能起到匡正某些史籍对年代记载的舛误，也能全面地反映出学术界对纪年的不同看法。它的主要特点是准确性、直观性和全面性。

六 以实例举证“读史年表”的应用价值

（一）以辽史为例看“读史年表”的准确性与直观性，顺及辽史读史年表的编撰

辽朝是以契丹民族为主体所建立的王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907年“燔柴告天，即皇帝位”，916年始建元“神册”以后，至1125年被女真民族建立的金朝所灭，在我国历史上存在了两百多年（不包括西辽）。对于辽史的纪年，现已基本搞清，学术界不存异议，问题是几部主要史籍——《辽史》、《契丹国志》（以下简称《国志》）、《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下合称新、旧《五代史》）、《通鉴》等对其纪年互不一致。例如，辽太祖天赞元年，依《辽史》和《通鉴》所记，为壬午年，即922年；而《国志》却记为辛巳年，即921年。关于这一点，贾敬颜、林荣贵在标注《国志》时即予指出：“自天赞元年始，《国志》与《辽史》干支相错一年”，但未指出何是何非。再看天显元年，《辽史·太祖纪》记：“夏四月丁亥朔”（《历象志》记同），可知该年为丙戌年，即926年，相当于后唐明宗天成元年。而《通鉴》记为：“（天成）二年（丁亥年，即927年），春正月癸丑朔……契丹改元天显。”《旧五代史》又记为：“（天成）三年，德光伪改为天显元年”（《新五代史》所记同），由此可见三者所记皆不相同。再看辽太宗会同元年，《辽史·太宗纪》记曰：“会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历象志》记同），可知为戊戌年，即938年，相当于后晋高祖天福三年；《旧五代史》记：“天福三年……契丹改元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新五代史》记同），与《辽史》的记载是一致的；然而，《通鉴》则记为：“天福二年……契丹改元会同”（《国志》记载与此同），天福二年为丁酉年，相当于937年，这个记载与《辽史》和新、旧《五代史》相差一年。而我们知道，“元年”一误，下面的年代全误。

从以上的例子不难看出，几部主要史籍对辽史的纪年是有差异的。那么，何者的记载是正确的呢？这是作年表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采用行之有效的、以出土文物证史的方法则不难得出结论。北京房山辽塔出土砖文有“天显岁次戊戌五月拾三日己未”的字样，^①我们用以对照《辽史》，戊戌年是天显十三年（这年十一月改元“会同”），可见两者相合；而《通鉴》和《国志》是在上一年（丁酉年）记“是年，契丹改元会同”，这样，戊戌年就不是“天显”

^① 见《全辽文》卷四。

年号，而应是“会同”二年了，可见与砖刻文不符，从而可断其记载有误。我们再进一步考证戊戌年“五月十三日”，正是干支记时的“己未”日，前后对照，更证其确实无误。

再据《辽会同中原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记》^① 末尾纪年为：“时会同九祀，龙集敦牂。”所谓“敦牂”，是太岁纪年的称谓，据《淮南子·天文训》：“太阴在午，岁名曰敦牂。”即相当于干支纪年的“午”，按《辽史》所记年代，“会同九年”正是“丙午年”，与此《幢记》所刻吻合，而按《通鉴》与《国志》，“会同九年”却是“乙巳年”，与《幢记》相差一年。又据《宋晖造像题记》，其纪年为“会同十年岁此（次）丁未”，也与《辽史》合，与《通鉴》和《国志》有异。《释志愿舍利佛牙石匣记略》纪年为“天禄三年岁次己酉”，均与《辽史》合，而《通鉴》和《国志》“己酉年”为“天禄二年”，等等。

这样，我们既发现了几种史籍对其年代记载的不同，又考证出正确的纪年，我们的“读史年表”就可按下表方式进行编制：

公元	干支	《辽史》	《契丹国志》	《资治通鉴》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916	丙子	神册② 1 太祖耶律阿保机	神册 1	神册 1		
917	丁丑	2	2	2		
918	戊寅	3	3	3		
919	己卯	4	4	4		
920	庚辰	5	5	5		
921	辛巳	6	天赞 1	6		
922	壬午	7	2	天赞 1		
		天赞② 1				
923	癸未	2	3	2		
924	甲申	3	4	3		
925	乙酉	4	5	4		
926	丙戌	5	6	5		
		天显② 1				
927	丁亥	2 太宗耶律德光②	天显 1	天显 1		
928	戊子	3	2	2	天显 1	天显 1
929	己丑	4	3	3	2	2
930	庚寅	5	4	4	3	3
931	辛卯	6	5	5	4	4
932	壬辰	7	6	6	5	5
933	癸巳	8	7	7	6	6
934	甲午	9	8	8	7	7
935	乙未	10	9	9	8	8
936	丙申	11	10	10	9	9
937	丁酉	12	会同 1	会同 1	10	10
938	戊戌	13	2	2	11	11
		会同② 1			会同 1	会同 1
939	己亥	2	3	3	2	2

说明：① 黑体为正确纪年。

② ②为改元月份。

① 见《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九。



因为辽史的纪年我们已经能辨其正误。则可将正确的纪年以黑体字标出，并加以说明。这样，此“读史年表”就有两个明显的作用：（1）匡正某些史书的纪年之误，体现出“读史年表”的准确性；（2）翻查方便，正误一目了然，充分显示出“读史年表”的直观性。

（二）以前凉史为例看“读史年表”的全面性，顺及前凉史读史年表的编撰

“读史年表”除具准确性、直观性的特点外，还有全面性的特点。

史籍上对年代记载的不一，除了我们经过考证，现已能辨其正误者外，也有不少至今无从定夺，学者们见仁见智，持有不同的看法。如前凉政权，据龚颖（宋）《运历图》、王应麟（宋）《玉海》，从张寔至张玄靓的41年中立有永安（314~320年）、永元（320~324年）、太元（324~346年）、永乐（346~353年）、和平（354~355年）、太始（355~363年）等年号。而据《晋书·张轨传》所载，除张祚即位改元“和平”年号，用一年余外，其余皆袭用西晋“建兴”年号至建兴四十九年（361年）。

历史年代不乏这种两说三说的情况，上文已指出如匈奴冒顿单于即位一说在公元前209年，一说在公元前210年。南越赵佗一说立于公元前207年，一说立于公元前204年。乌孙原附匈奴，后背匈奴西迁，史家一般以其西迁为其立国之年，而西迁年代则有四说。回鹘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磨延啜即位年一说745年，一说747年；武义成功可汗顿莫贺即位年一说779年，一说780年；昭礼可汗即位年一说824年，一说825年等等。吐蕃、南诏、渤海的年代皆有这种情况。

凡遇到这种情况，历史年表为了格式上的一致，不可能将几种意见都列入表中，只能撷取其一，而将另外的意见或在注解中说明（我们现今所见的历史年表，很多连这样的注解都没有，极易产生片面性），在读者翻查年代时就会引起诸多的不便。如前凉政权，如按《玉海》等记列表，则在新疆出土文物中曾有“建兴卅六年”^①之记，年表则查不出；若按《晋书》所记作表，则薛应旂（明）《甲子会纪》所指永安等年，就无处可查。而我们根据这种具体情况做出“读史年表”，则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表如下：

公元	干支	前凉		晋
		《玉海》等记	《晋书》等记	
314	甲戌	永安 1 张寔	建兴 2 张寔	建兴 2 愍帝司马邺
∴	∴	∴	∴	∴
320	庚辰	6	8 张茂 [⊕]	太兴 3 元帝司马睿
∴	∴	永元 [⊕] 1 张茂	∴	∴
∴	∴	∴	∴	∴
324	甲申	4	12 张骏 [⊕]	太宁 2 明帝司马绍
∴	∴	太元 [⊕] 1 张骏	∴	∴
∴	∴	∴	∴	∴
346	丙午	22	34 张重华 [⊕]	永和 2 穆帝司马聃
∴	∴	永乐 [⊕] 1 张重华	∴	∴
∴	∴	∴	∴	∴

^① 《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载《文物》1973年第10期。



续表

公元	干支	前凉		晋
		《玉海》等记	《晋书》等记	
354	甲寅	和平 1 张祚	和平 1 张祚	永和 10 穆帝司马聃
355	乙卯	2	2	11
⋮	⋮	太始④⑤ 1 张玄靓	建兴④⑤ 43 张玄靓	⋮
361	辛酉	7	49	升平 5
362	壬戌	8	升平⑤ 5	隆和 1 哀帝司马丕
363	癸亥	9	6	2
⋮	⋮	太清① 1 张天锡	7 张天锡④	兴宁③ 1
⋮	⋮	⋮	⋮	⋮
376	丙子	14	20	太元 1 孝武帝司马曜

此“读史年表”将学界尚未定夺正误的不同记载全面地反映出来，传达给读者，避免了顾此失彼的片面性。

（三）再以渤海史为例，顺及渤海史“读史年表”的编撰

渤海史纪年也有类似情况，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对从开国君主大祚荣卒后，其子大武艺即位改元“大兴”起 [相当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或八年（720年）] 至其十四代王大玮璿即位 [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 为止的170多年纪年认识的不同，这170多年的纪年几乎占了整个渤海自开国（698年）至亡国（926年）228年的五分之四，可见比例之重。而其余两代（大玮璿与大湫谥）亦因“薨年、立年史均失载”，“皆出自假定”。^①

东北史大家金毓黻在其名著《渤海国志长编》中依“当年即位，翌年改元”的通例提出大武艺于唐开元七年（719年）即位，下年（720年）改元“仁安”，遂将仁安元年定位于720年。他说：“渤海王卒，当年改元或翌年改元史无明文可考，兹用翌年改元之例。”^②他在书中所作的《渤海年表》可以说对后人的影响很大，以后不少年表皆依此而作。^③而孙玉良作《渤海纪年订补》一文，^④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也是利用地下出土文物来进行考证的。他依据1980年在吉林和龙县龙头山出土的《贞孝公主墓志》进行考证，指出：“《贞孝公主墓志》中，记载了贞孝公主死于大钦茂‘大兴五十六年六月九日壬辰’，葬于‘其冬十一月二十八日己卯’。核对陈垣所编《二十史朔闰表》等历史年表，该年为壬申年，即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年。据此往前推算，可确切推知大钦茂大兴元年，当是丁丑年，即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七三七年。”而金毓黻则将大钦茂大兴元年定为下年，即738年，两者相差一年。孙玉良的意见是：“《新唐书·渤海传》对渤海十五王中的九王改元……无一注明是翌年改元，也未注明是当年改元，但从文势上看，即位和改元是紧连在一起的，似乎是同时发生的情况……大钦茂是即位当年

① 《渤海国志长编》卷六。

② 《渤海国志长编》卷六。

③ 见王承礼《渤海简史》所附《渤海年表》和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陆峻岭、林干：《中国历代各族纪年表》。

④ 孙玉良：《渤海纪年订补》，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改元大兴，而不是即位翌年改元大兴。同时，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既然大钦茂是即位当年改元，那么《新唐书》中对和大钦茂即位、改元做了同样记载的八王，也无疑是同大钦茂一样，均是即位当年而改元。”朱国忱、魏国忠著《渤海史稿》一书^①所附《渤海纪年对照表》即与孙文的意见相同。这样，对渤海国史的纪年，在当前学术界就有以不同观点所作的不同纪年表。渤海史的“读史年表”就应全面地反映这种情况。表可如下：

公元	干支	渤海		唐
		第一种意见 ^①	第二种意见 ^②	
713	癸丑	1 高王大祚荣	1 高王大祚荣	先天 2 玄宗李隆基
∴	∴	∴	∴	∴
719	己未	7 [大武艺⊖]	7	开元 7
720	庚申	仁安 1 武王大武艺	仁安⊖ 1 武王大武艺	8
∴	∴	∴	∴	∴
737	丁丑	18 [大钦茂]	19	25
738	戊寅	大兴 1 文王大钦茂	大兴 1 文王大钦茂	26
∴	∴	∴	∴	∴
774	甲寅	37 (宝历 1)	38 (宝历 1)	大历 9 代宗李豫
∴	∴	∴	∴	∴
793	癸酉	56	57	贞元 9 德宗李适
794	甲戌	57 1 废王大元义⊖ 中兴 1 成王大华屿 [大嵩璘]	中兴 1 成王大华屿 2 正历 1 康王大嵩璘	10
795	乙亥	正历 1 康王大嵩璘	2	11
∴	∴	∴	∴	∴
809	己丑	15 [大元瑜⊖]	16	元和 4 宪宗李纯
810	庚寅	永德 1 定王大元瑜	永德⊖ 1 定王大元瑜 2	5
811	辛卯	2	3	6
812	壬辰	3 [大言义]	4	7
813	癸巳	朱雀 1 僖王大言义	朱雀 1 僖王大言义 2	8
∴	∴	∴	∴	∴
817	丁酉	5 [大明忠]	6	12
818	戊戌	太始 1 简王大明忠 [大仁秀⊖]	建兴⊖ 1 宣王大仁秀 7	13
819	己亥	建兴 1 宣王大仁秀	2	14
∴	∴	∴	∴	∴
830	庚戌	建兴 12 [大彝震]	建兴 13 宣王大仁秀 咸和 1 大彝震	大和 4 文宗李昂

① 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编辑室，1984。